■重温经典

马克思哲学的关怀是什么

□张艳涛

马克思在直面现实、直面现实的人、直面实践、直面问题中终结旧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变革,创立了一门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马克思曾提出一系列有关哲学理解的命题，透过这些命题，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关怀是什么。

1、哲学是对“尘世”进行批判和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批判哲学”。马克思哲学不是对“彼岸世界”的探讨，而是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如果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就必须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本评价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因此，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马克思哲学正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解释世界中改变世界。

马克思哲学的优点恰恰在于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所主张的批判，主要是现实的实践批判，即“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马克思在哲学批判观上优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他扬弃了逻辑批判与道德批判而达到了实践批判的高度。

2、哲学是“非常懂得生活”并为现世提供智慧的“生活哲学”。马克思哲学是对“尘世”进行批判和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批判哲学”，这意味着它内在关注现实生活。人类的生活世界可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决不是向私人领域的“龟缩”，更主要的是向公共领域的“挺进”。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发现：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满意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认为政治与哲学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革命实践的作用，他没能找到从抽象王国通向生活世界的现实道路。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马克思把哲学看作“为现世提供智慧”的哲学，其意是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来理解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律并为人的生活提供智慧和方法。与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其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3、哲学是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为劳苦大众提供心灵引导的“人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关注现实生活，主要是关注现实的人。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要研究现实问题，就必须要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世俗基础”和“经济根源”，进而探索人的解放的条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实的个人必然处于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之中。因此，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很快就推进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构建。马克思透过物与物的关系把握到人与人的关系，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透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个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为代价。具体而言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针对这种情境，马克思始终围绕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展开自己的哲学研究，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人的生存发展，从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剩余价值规律） 最终得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论。

4、哲学是超越现实并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不是对现实的默认和肯定，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改造和超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只是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可见，在实践哲学视域，“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

5、哲学是关注无产阶级解放并成为人民精髓的“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意蕴值得深入挖掘。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过程中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分析中。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政治解放就是使人从一切封建等级特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平等独立的人格，它在实质上就是用市民社会反对封建国家专制对人的压抑，消解“人的依赖”。这种解放的积极意义在于消解具有封建国家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关系，把人当作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来理解，其历史局限性在于它把人变成具有利己主义的个人。由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人类解放的任务，就是使人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物役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种解放的实质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把人变成孤立的且互相敌对的利己主义个人，消解“物的依赖”

■新世纪论坛

应十分重视“一切依靠群众”

□毛定之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已经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必须继续努力奋斗。这一、二十年中，我国将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历史性跨越。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依靠群众”仍然是我们需要时时注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第一，必须注意关心群众。毛泽东曾经指出：“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毛泽东还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更为重要。依靠群众，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特别注意群众的政治诉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第二，必须注意教育引导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是放任群众，而是在关心群众、教育引导群众的基础上依靠群众。做好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在涉及群众切实利益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动机和出发点多么美好，都需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不能使用强迫命令的手段。

第三，必须注意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在完善市场经济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新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大量出现。据有关资料介绍，上海市登记的社会组织，从1999年开始，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已从2002年底的24.2万个，增加到了2006年底的35.4万个。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是一个趋势。我们应当正确认识这个趋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搞好社会组织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善于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和管理社会组织，及时在新的社会组织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经常开展党的活动，把党的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落实到新的社会组织中，使社会组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健康的作用。

第四，必须注意发挥新中等阶层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社会阶层等日益多样化，一个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吴敬琏曾撰文指出：“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老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职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我们要看到这个阶层是在党的培养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利益追求在总体上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希望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民族振兴。这个阶层稳定了，社会很大程度上就稳定了；这个阶层能够与党同心同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得多。因此，如何注意及时了解这个阶层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如何在政策上注意保护其合理的利益需求，如何充分发挥其在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

□陈璞平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陈独秀在积极投身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同时，凭着对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理解和对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至今依然发人深省。

一、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从苏俄国家利益考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决策，因而也就经常受到陈独秀的抵制和反对。他曾对包惠僧说：我们“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呼吁：“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有中国人自己领导！”当共产国际要求他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他断然拒绝，并说：“中国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当时，奉共产国际为神明，陈独秀能够清醒地保持这种独立意识，强调中共应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胡绳曾经说过：“陈独秀这个人有一个长处，有民族自尊心，用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他不高兴。这点和毛主席的情绪有点相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要有点民族骨气。”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陈独秀正确地理解了关于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他认为，“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意义。”他进一步提出：“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一人失其生产力，则社会失其一部分之安宁幸福。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陈独秀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能预见到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非常可贵的。

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中共建党之初，有些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认为革命一成功，就应该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为此，他们指责俄国“现在还闹什么新经济政策，未免是变节欺人”。陈独秀尖锐批驳了这种“左”倾观点。他认为，由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并非旦夕所能促成”，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猛进”，一定要在“创造无产阶级经济力”之后，才谈得上过渡，否则就是把“共产社会看得不值钱”。他断言：“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他说：“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里，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经历了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事件，使陈独秀对社会革命的成功和反复，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四、社会主义是使多数人民得到幸福

陈独秀认为，“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而“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所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使人民生活进步、幸福，“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的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在这里，陈独秀显然已把使多数人民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来认识。社会主义是使多数人民得到幸福，这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理解。

五、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

陈独秀认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他还进一步指出：“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并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种把社会主义是使大多数人幸福与平均主义（均富主义）区分开来的思想认识，从今天来看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六、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陈独秀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定它是哪一种社会，……更不能因为他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因此，“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派，自始便未尝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尤其是不发达的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允许存在的，也是必然的。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私有经济又不同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私有，而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他说：“中国国民革命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虽然是“财产公有”的社会，但“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今天重新认识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多种成分并存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七、社会主义建设是开放型的

在陈独秀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的爆发，已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当年发达国家大不相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处在这样的大变动时代，“第一要明瞭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瞭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陈独秀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和任何国家通商往来”，“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颈脖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或苦笑的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他还说：值此国际大势之下，“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毛泽东后来对此评价说，虽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但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八、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须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所以“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他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决定的”。他说：我们不要“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陈独秀也并非无原则地要求向资本主义学习，他提出的对外开放，并非崇洋媚外，也不是全盘西化，他认为，“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倘国人不思觉醒，“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虽然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对经济发展中“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其方法是辩证的，其态度是理性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之时，陈独秀的这种远见卓识是难能可贵的。

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陈独秀高擎民主科学大旗，成为中国思想界最耀眼的明星。被开除党籍后，他根据“苏俄二十年的经验，深思熟虑六七年”，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大众民主思想。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称近代人类社会的三大天才发明”。民主是超时代的，“民主的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但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的全部内容”。“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就是“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回事。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了民主”。他断言，“苏维埃制度如果缺乏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他尖锐批评了那种“民主已经过时，无产阶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的极端观点，指出十月革命以来，“苏联领导层轻率地把民主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陈独秀大声疾呼，“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陈独秀痛切地指出：“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应该说，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是真理与谬误的结合，其中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对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其中对社会主义“政制”的深刻反思和尖锐批判，充分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陈独秀关于民主制本质的探讨，摒弃了以往将民主制视为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私有物的传统观念，更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认识和继承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开创了先路。